

电话会话中人际距离的 言语调节手段

刘莉芳 著

DIANHUA HUIHUA ZHONG RENJI JULI DE
YANYU TIAOJIE SHOUDUAN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电话会话中人际距离的 言语调节手段

刘莉芳 ◎ 著

DIANHUA HUIHUA ZHONG RENJI JULI DE
YANYU TIAOJIE SHOUDUAN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话会话中人际距离的言语调节手段/刘莉芳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668 - 1882 - 9

I. ①电… II. ①刘… III. ①电话—语言交流—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6865 号

电话会话中人际距离的言语调节手段

DIANHUA HUIHUA ZHONG RENJI JULI DE YANYU TIAOJIE SHOUDUAN

著者: 刘莉芳

出 版 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古碧卡 姚晓莉

责任校对: 邓丽藤

责任印制: 汤慧君 王雅琪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科普电脑印务部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66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23.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会话能够使交际者在完成特定社会活动的同时构建和调节人际距离。语言交际中的人际距离具有可变性和可调节性。言语手段的运用能够实现人际距离的构建与调节。

本书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调节人际距离的功能出发,对电话语料进行考察,从会话层面到词语层面,自上而下地探讨实现人际距离调节功能的言语手段,构建了一个适用于电话会话多对一情况下的分析系统。调节人际距离的言语手段存在于该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语言结构层面中。按照会话结构的功能,该系统由四个子系统构成,分别为身份确认系统、礼貌系统、话语控制系统和反馈系统。在每一个子系统下,不同的语言形式或项目为实现人际距离的调节而聚合,在语篇和互动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从结构层次差异上看,调控手段主要存在于三个结构层面:一是词语层,包括词和话语标记;二是话轮层,包括句子和句子构成的话轮;三是组织层,包括序列结构和话题组织。不同的人际距离倾向会制约和影响调控手段的效果。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功能—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了整体框架,运用多种方法对语料进行剖析,对一定范围内调节人际距离的手段进行了探讨。本书为语言具体人际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为某些语言手段提供了互动层面的解释。

刘莉芳

2016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1章 绪 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人际距离的概念及其研究概述	3
1.3 会话分析与电话会话研究概述	12
1.4 研究方法和语料	19
1.5 研究框架的确立	25
1.6 研究价值	32
第2章 身份确认系统	33
2.1 身份确认系统概述	33
2.2 呼叫—应答序列	33
2.3 身份确认序列	39
2.4 小 结	50
第3章 礼貌系统	51
3.1 礼貌系统概述	51
3.2 问候语	54
3.3 结束语	58
3.4 小 结	69
第4章 话题控制系统	71
4.1 话题与话题控制概述	71
4.2 话题的导入	73
4.3 话题的保持	79
4.4 话题的转换和结束	87
4.5 小 结	98

第5章 反馈系统	100
5.1 反馈系统概述	100
5.2 一般支持性言语反馈	101
5.3 积极支持性言语反馈	106
5.4 小 结	112
第6章 结 语	113
6.1 结 论	113
6.2 创新点	117
6.3 不 足	117
参考文献	119
后 记	128

第1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语言不仅可以用来传情达意，还可以用来构建和调节人际距离。人际距离不仅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也存在于心理认知层面。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社会就是人际交往（interaction）的存在，交往受各种各样的目的驱使，（在心理层面上的）个体之间的“远”和“近”构成了人际距离。本书所涉及的人际距离指的是心理层面上的人际距离，是一个人在交际活动中能够认识和感知到的与他人之间的疏远或亲近的程度。它是交际者对彼此之间的“远”“近”进行心理认知和情感体验的结果。

人际距离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在语言交际活动开始前，人们可以通过对彼此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认识来确定人际距离的远近，比如师生关系、朋友关系、陌生关系等。但是，随着交际活动的展开，人际距离往往会发生变化，比如陌生关系也可以感到很亲近，朋友关系也可以感到很疏远，交际双方都可以运用一定的言语形式或手段来调节人际距离，达到交际目的。因此，人际距离具有可变动和可调节的特点，或者说具有动态性和协商性。

一般来说，在会话过程中，人际距离呈现出三种动态趋势，即维持、拉大和缩小。从这个角度看，语言交际中的人际距离包括两个层面：静态的和动态的。静态层面的人际距离指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它源自个体由于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等因素导致的社会位置的差异，社会心理学常常将之概括为角色关系，比如朋友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等。由于角色的特征性，交际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往往具有可预见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交际活动的类型、交际者的角色和交际目的来推测某个或某类言语交际活动中的人际距离趋势。人际距离趋势对具体的话语结构、策略和言语形式的运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反之，不同的话语结构、策略和言语形式又体现着人际距离的不同趋势。所以，话语的构建和理解过程也是人际距离的动态显现过程。这是人作为交际主体的能动性的体现。

那么，话语如何显现交际者的人际距离？在以往的汉语研究中，学者们经



常通过研究某种语言形式或手段而认为其具有构建或者调节人际距离的功能。比如称呼语既可以反映交际者之间的权势关系（朱永生，1990），也可以协调交际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李明洁，1996），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高慧芬，1997）。在会话中，称呼还有表示亲昵、疏远等言外之力（梁佳，2002），在会话结构上也具有一定的构建毗邻对、维持话题的作用（来鲁宁、郭萌，2003）。再如疑问式的寒暄多分布在社交距离居中的膨胀部分（龙又珍，2009）；有些口语话语标记，如“嗯”“是”“对”在交际角色不平等的情況下运用得更加普遍（刘丽艳，2005）；谈话中的否定反问句常用于地位比较平等的说话人之间或者地位较高的人对地位较低的人之间（刘娅琼，2010）。这些研究结论表明人际距离的差异对不同的语言形式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手段是否可以形成功能上的聚合，在会话结构上如何分布，是否有模式或者规律可以遵循，却鲜有人问津。当然，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在当前条件下，想要全面地描写各种不同人际距离的构建和调节过程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语言的使用者是人，个体的语言是社会语言的反映，它同样遵循和反映着社会的规则。因此，我们如果从微观入手，观察和描写不同交际对象和某一特定交际者的会话过程，就有可能发现交际者是如何运用语言手段来动态地构建和调节他们之间的人际距离的，这样才能对语言手段在自然语言中的运用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选取的语料形式是电话会话。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看，电话会话比一般语料更有优势。首先，作为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的重要部分，电话会话提供了最简交际形式下的会话模式，是研究互动行为很好的入手点；其次，由于电话会话不是面对面的交际^①，因此，表情和态势等无法发挥作用，交际者对双方的人际距离的感知和调节可以较明显地通过言语形式体现；最后，由于技术的进步，获得高质量的录音不再是一件难事，对于研究者来说，转写和复听的效果大大提高，可以更为准确地进行分析。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电话会话是自然会话研究中一项非常好的天然语料，也是规律性较强的一类语料。

因此，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电话会话入手，尊重语言事实，以某个时间段内不同交际者打给某个特定交际者的电话会话录音为语料，对交际双方在不同的人际距离趋势下运用的言语调节手段的情况进行描写和分析，探讨这些手段如何在语言的动态运用中实现调节人际距离的功能。

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和语料，本书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 (1) 在电话会话中，调节人际距离的言语手段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 (2) 在会话过程中，交际者之间的人际距离倾向是如何动态地体现出

^① 新型的可视电话可以通过屏幕使实现某种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际。本书的语料来源没有这一类型，仍是常见的不可视电话会话。

来的？

(3) 在调节系统中，交际者具体运用哪些言语手段来调节人际距离？

1.2 人际距离的概念及其研究概述

只有当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受到重视的时候，人际距离才作为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之一进入了语言研究领域。由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影 响，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中，关于人际距离的说法和见解不尽相同。本节将以人际距离为线索，对不同学科和理论中人际距离和语言手段之间的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

1.2.1 权势和距离

许多研究在对语言现象进行阐释时都会用到“权势 (power)”和“距离 (distance)”这两个术语。这是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对语言的影响时首先提出来的两个影响因素。布朗和尤尔 (Brown G. & Yule G. , 1983: 57) 认为：“如果把社会关系中的阶层看作是垂直线，一致关系就是水平线。” (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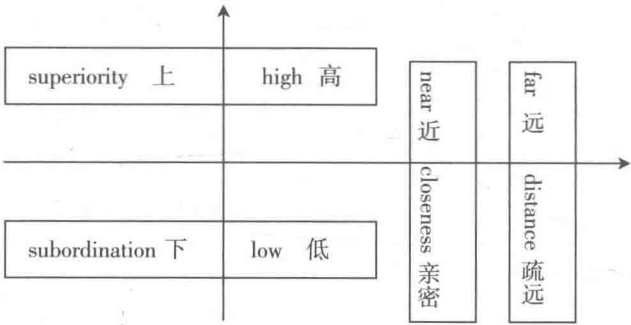


图 1-1 布朗的权势与一致关系示意图

然而，学者们关于权势和距离的定义与见解并不是如此简单，而是各有乖互。

我们先看垂直线上的权势，权势既可以单纯看作社会地位或阶层造成的差异 (Cansler D. C. & William B. S. , 1981)，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年纪、性别以及环境中的角色等而形成的控制关系 (Brown R. & Gilman A. , 1960)。这种控制关系可以划分为平等 (equal) 和不平等 (unequal) 两个量级。许多学者用角色关系来区分，比如，不平等的关系有老板和雇员、领导和下属、教师和学



生、医生和病人、父母和孩子等，平等的关系有同事之间、学生之间、团体成员之间、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等。然而这种按照角色来区别平等与不平等关系的观点存有争议，主要是因为角色关系并不能和权势平等与否一一对应，比如司机和乘客、售货员和顾客，有的学者归为平等关系，有的学者归为不平等关系。这是由于对角色概念的理解和期待存在差异而造成的。角色关系只能解释因社会身份、地位等形成的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差异，而无法成为检验交际活动中双方地位对等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时，由于角色来源于社会生活，往往已经固定化，因此在不同的交际活动类型中，交际者对权势关系或角色关系可以进行动态的调整，做出消除平等或不平等的努力。后来，话语分析学派把权势当作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所拥有的某种形式的控制力量，以此来解释政治话语、医患关系对话过程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事实上，权势反映的是人们在会话过程中心理感知的纵向的人际距离。

我们再看距离，有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亲密度（relational intimacy）、相熟度（familiarity）、情感距离（emotional distance）等说法^①。这些说法都着眼于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往频度和喜恶程度，是人的内心情感方面的体验，是水平线上的尺度，反映的是人们在会话过程中心理感知的横向的人际距离。

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垂直线上的权势还是水平线上的距离，它们反映的都是都在社会结构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所形成的客观上的静止的人际距离，是语言环境的重要构成因素，权势和距离对这样的人际距离用二维的方式进行了解构。

在对距离与语言的关系研究中，社会语言学和后来的语用学都将人际距离看作自变量，将语言项目看作因变量。在不同的人际距离下，语言形式的选择不同，主要体现在：

（1）代词。社会语言学家布朗和吉尔曼（Brown R. & Gilman A., 1960）在研究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代词用法的过程中，第一次用权势和一致作为说话人选择不同代词的变量，来考察说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语言项目的选择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他们认为，权势是上下级的关系，一致是平等关系，相应地，代词有权势语义（power semantic）和平等语义（solidarity semantic）之分，在运用过程中分为两类，分别用 V（vous，即礼貌形式）和 T（tu，即亲密形式）表示。在权势关系中，T 和 V 不具有相互性，只有 T/V 一种模式，即上级或长辈用 T 表示亲密，而下级或晚辈用 V 表示尊敬；在一致关系中，可以有 T/T 和 V/V 两种模式，即同辈之间用 T/T 表示亲密，用 V/V 表示疏远。陈松岑（1986）运用这两个变量对北京话中的“你”和“您”进行了调

^① 参见 SPENCER - OATEY H. Reconsidering power and distan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 26 (1): 1 - 24.

查,认为汉语代词的运用不仅受交际双方人际关系的制约,还受社会和语境的制约。刘世铸、张征(2003)认为T/V是一种最简模式,而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较复杂,有很多T/V的变体形式,不能简单地归入二分法的哪个层次,同时使用上也要结合具体语境。

(2)称谓或称呼。布朗和福德(Brown R. & Ford M., 1961)对工作环境中不同阶层的交际者的口语交际情况进行了调查,指出在非对称关系中交际者使用某个称谓形式的目的是显示权势,而相同的称谓形式用在对称关系中则表明交际者之间社会距离的疏远和正式程度的加大。文秋芳(1987)对汉语称呼语的形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类,绘制出汉语常用称呼语的使用规则图,将权势与距离进行了“中国化”,其中涉及的社会因素有被称呼人的年龄、姓名、场合、与被称呼人的关系以及密切程度等。后来的研究者结合言语行为、会话分析等理论和方法,认为称呼语不仅具有表示亲密或疏远等积极或消极的言外之意(梁佳,2002),还具有构建会话中的毗邻对、维持话题等作用(来鲁宁、郭萌,2003)。称呼语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开始转向微观的、质的研究(刘永厚,2010)。

总的说来,在语言学领域社会语言学最先关注到了语言项目随人际距离而变化的情况,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语言学界还兴起了对语言中的社会标记(social markers)的探讨,如反映社会阶层(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素(etic)”和“位(emic)”(Robinson W. P., 1979)等。但是,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在语言中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素”是极难的。无论是“素”还是“位”,社会与语言的联结点还只局限在单一的语言项目层面,未能进入更大的言语单位层面。

1.2.2 话语基调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诞生,使得我们更加重视社会交际中的语言。韩礼德(Halliday M. A. K., 2007: 82)认为语言必须表现出我们的参与。语言是社会符号,人们在日常语言交换中展现出社会结构,对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加以肯定,建立和共享有关价值和知识的系统,应该在社会语境下来解释语言。语境由三个要素组成:语场(field)、语式(mode)和语旨(tenor)。语场指的是话语活动的类型;语式指的是语言传播的方式;语旨指的是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在话语中,也可以理解为“话语的语旨(tenor of discourse)”,即话语基调。

韩礼德(2002: 56)将话语基调的角色关系分为第一级社会角色(first-order social role)和第二级社会角色(second-order social role)。第一级社会角色是长期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如师生、父母与子女、同龄的孩子、医生和患者、消费者和售货员、火车上相识的人等;第二级社会角色是暂时的、动态的交流角色关系,如话语的提问者、回应者、质疑者、反驳者等,即话语角色。

韩礼德认为第一级社会角色的区分不需要语言来解释印证,第二级社会角色则进入并存在于语言中,它能够决定说话人的语气项目等的选择。话语角色和社会角色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在课堂上,老师总是提问者,学生总是回答者,和我们平常认为学习者是提问者的观念刚好相反。韩礼德还用假设的教授初学者的情境来说明三者的关系,我们引用如下 (Halliday M. A. K., 2002: 115):

原文:

Tenor: Equal and intimate: three young adult males, acquainted
 - but with hierarchy in the situation [two experts, one novice]
 - leading to superior-inferior relationship

译文:

话语基调: 平等而且亲密: 三个成年男性, 熟识的
 但在情境中具有层级性, [两个教练, 一个初学者]
 倾向于强势—弱势角色关系

我们看到,话语基调着重强调的是第一级社会角色对第二级社会角色的制约和影响,而对交际过程中的角色有无变化没有给予关注,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预测仍是静态的人际距离的体现。

关于话语基调的制约因素,波恩顿认为有三方面:权力、接触和情感,情感的标记与否在于权利和接触的选择,她将其应用在了对英国英语的称呼语的调查中,对解释称呼语的不同运用有一定的说服力^①。韩礼德的学生马丁受波恩顿的影响,对话语基调的制约因素进行了进一步区分 (见图 1-2)。



图 1-2 马丁对话语基调制约因素的分类

① 参见高彦梅. 话语基调模式探讨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1).

话语基调与人际功能的实现密切相关。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之一是人际功能。人际功能的选择项目是一个系统,包括语气、模态、评价以及语境中由角色关系决定的类似项目等。韩礼德以交流中的小句为单位,分析了话语基调对句子中的人称、语气等项目的选择情况。马丁将话语基调的研究扩展到了语篇层面。他认为这些因素在语音层、词汇层、语法层和话语层都有着具体的表现方式,比如,在话语层,地位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对话语的主导和顺从,接触的不同则体现在表达方式的繁简,情感的变化主要由扩展来实现。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对语篇的构成以及交际者的评价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过,马丁着重于从理论构建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未对完整的语篇形式或会话做详细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交际者本身以及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的关系作为语言环境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并将其列为影响语言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认为话语基调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话语—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话语是否符合交际者的角色或身份,以及话语对交际者自身角色的构建,对话语具体的语义语法项目进行审视,是一种趋内的视角,尚未对交际者之间由于互动形成的动态趋势及其在会话层面上的影响予以重视。后来,韩礼德的合作者哈桑(Hasan R., 1985: 96)又进一步解释说,话语基调不仅包括参与者的角色,也包括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哈桑把话语基调扩展到社会距离,其关注点正是交际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者不仅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还要进行互动才能实现顺利交际。这也是后来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的理论出发点。

通过社会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人际距离的研究分析,我们看到,人际距离的构成从二维转向了三维,在语言中的体现从单一的、零散的语言项目上升到系统的、多层面的语言系统。在人际距离和语言的联结点,上,所观察的语言单位也不断地从小变大,从词语、句子开始走向话语、语篇。

1.2.3 礼貌原则和语用距离

语用学主要探讨的是对话语的理解、推导和制约因素的解释,因此出现了对语言现象解释力很强的礼貌原则。

礼貌原则是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形成的。言语行为的本质是交际者借助话语所传达的交际目的或意图,只要我们所说的话传达了—定的交际意图,完成了一定的功能,我们就是在实施言语行为。布朗和列文森(Brown P. & Levinson S. C., 1978)用礼貌来解释言语交际中的不同行为,认为其核心就是人们要讲究礼貌,维护自己或他人的面子。在会话过程中,谈话双方同时面临着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威胁。人们不惜采用种种积极的或消极的策略来保护面子,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程度。说话人既要“参与”(involvement)又

要“独立”(independence),很像“刺猬效应”中的刺猬,既要相互取暖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看到的礼貌和面子的实质是人们对人际距离进行的调节。

布朗和列文森提供了一个基本礼貌模式,他们划分了三种社会变体,一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对称关系);二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相对权势(非对称关系);三是在特定文化中绝对阶层的强加程度。权势和距离是说话人在实施特定言语行为时,选择不同语言项目的重要参数。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形成礼貌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比如在亚洲文化背景下,话语和礼貌之间的特点还要受到内外关系的制约(Lim Tae-Seop, 1994)。向内的人际关系主要受到儒家文化的五种关系的制约: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和朋友。外向的人际关系是偶然和别人发生的短暂的、临时的陌生关系,如商店的店员、银行柜台职员等。

斯科隆也认为,构成礼貌(面子)体系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权势、距离和强加程度。权势指在等级框架中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地位距离或垂直距离;距离指的是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亲密程度,体现在平等关系或负权势关系上;强加程度主要体现在话题的重要程度不同上。在斯科隆看来,话语是一个系统,它既包括一种共享的语言或行话、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包括这些特定群体成员间人际关系的特有形式。研究者要关心的是在不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交际者需要采取哪些语用策略。语用策略可以存在于句子层面、语篇层面和话语层面,表现为各种方式的使用,如指示词语、句法形式(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斯科隆还认为理解会话借助的不仅仅是指称、连词等衔接手段,还包括通过交际背景构建的客观知识、会话中毗邻顺序以及音律等手段。

在我国学者对礼貌现象的研究中,王建华(2001)提出用“语用距离”来说明礼貌现象中的人们的亲疏远近关系。他认为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用语用亲密度(intimacy degree of pragmatic distance)来描述。他还设定了初始语用距离和交际语用距离,用五种人际关系类型(陌生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和情爱关系)来衡量初始语用距离向交际语用距离的转变。吴学进(2004)将人物之间的亲密程度称为人际距离,通过对小说《遭遇爱情》中不同称谓语的统计,设计了表示小说人物之间距离值的图表来确定两个主人公之间是情爱关系还是工作关系。

我们认为这五种人际关系类型对分析言语交际中人际距离的变化并没有太大作用,原因是:①这五种关系并不是亲密度的阶梯式上升,比如家庭关系并

不一定比朋友关系更亲密；②有些关系是交叉的，比如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既可以是同事，也可以是朋友，只是角度不同；③这五种关系并不能对所有或者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和亲疏程度的差异进行区别，比如，《故乡》里迅哥和闰土的关系，迅哥认定的是朋友关系，用“闰土哥”称呼，而闰土用“老爷”回应，这里认定的关系既非朋友关系，也不是工作关系，而是社会等级。此外，在话语分析领域，语用距离是用来研究说话者和话语构建的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参数（Pocheptsov G. G., 1994: 765）。因此，我们认为把交际者之间的人际距离称为语用距离不够妥当。

1.2.4 话语分析中的身份构建与转换

话语分析的出现是语言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语言研究从形式到功能，从静态到动态，从词、句分析到话语、篇章分析，从语言内部到语言外部，从单一领域到跨学科领域的过渡（李悦娥、范宏雅，2002: 1）。目前学界对话语分析的定义因语言学家不同的着眼点而不尽相同。布朗和尤尔（1983: 3）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话语，认为语言具有交易功能（transactional function）和交流功能（interactional function），话语分析是对使用中的语言进行分析，话语分析学者应该尤其关注语言在会话中由于角色关系（role-relationships）、朋辈一致（peer-solidarity）等的协商而出现的话轮交换、说话人和听话人面子保全方面的现象。不过他们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书中，只对话语中的话题结构、信息结构以及衔接情况做了分析，并未涉及角色和身份的问题。

斯塔布斯（Stubbs M., 1983: 159 - 160）在论述言语行为和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曾指出，社会角色和言语行为之间的联系不仅需要文字上的表述，还需要有行为上的正确理解。他认为，要分析交际者之间的协调（negotiation），必须要对交际者从整体角度进行认识，弄清楚交际者展现的是他所代表的某个集体的行为还是他个人的行为，如会议主席的控制权可以从话语的整个话题进行分析，也可以从话语标记“well”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这些手段构建了说话者的身份。德菲娜（De Fina A., 2010）对话语和身份之间的磋商研究进行了回顾，认为身份的构建是说话人在话语中，尤其是自传性叙述中定位的过程。在会话中，身份的构建和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可以通过很多方面来寻找到蛛丝马迹，如话语、句子或者是复杂的表意分类系统，社会集团的特征，社会角色和态度，个人和群体的立场等。

近年来，机构性会话里交际者的身份构建，特别是医生和教师的身份构建成了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这种权势性的话语特点可以从话语控制和反馈的方



式上体现出来,比如提问的方式往往预定了病人的回答方式,还决定了病人的参与程度^①;反馈的程度和形式的差异能够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和感情,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反馈手段会对交际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一般性反馈只表明倾听,而高度支持性反馈还可以表示与说话人保持一致的趋向,是双方互动的积极性表现。董平荣(2012)以英语会话为语料,对中国学生和英国导师之间的身份建构和维持过程进行了分析。他将身份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话语角色,如话题的组织者与跟随者、提问者与回答者等;第二层次是行业身份,如导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等;第三层次是宏观身份,如英国人和中国人、男性和女性等。这个分层对处理不同文化背景和行业的会话有一定帮助。该书立足于导师与学生这一特定行业身份,对两者在话语角色上的差异进行了探讨,认为会话中的提问方式、话语标记、话题组织等方面都显示出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和特点。虽然语料属自然语料,但是由于导师与学生的人际距离在交际过程中始终处于维持状态,缺少对人际距离拉大或缩小的情况分析。

1.2.5 言语行为和人际策略

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学的影响和启示很大。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一直被视为语言学的两大阵营,然而言语行为理论不同于任何一个阵营,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这一理论是由哲学家奥斯汀(Austin J. L., 1962)提出,塞尔(Searle J. R., 1976)修订而形成的,核心思想是言语交际不仅是说话,也是一种行为,是以言行事、言中有行。它的价值在于将语言、社会、心理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奥斯汀把一个言语事件切分为三个部分: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将形式、意义和意图分开了,也被译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一般认为这三个行为的关系是:说话行为是表层的,是字面的本义;施事行为是蕴藏在具体言语之外的力量;而取效行为则是言语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言语行为的构成类型主要有五种:断言性、指令性、承诺性、表态性和宣告性。从显著性划分,又可以分为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塞尔认为,言语行为可以是连续的,而且一个言语行为还可以成为另一个言语行为的目的或意图。

如果把言语行为理论上升到一个交际事件来看,调节人际距离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不会直接由言语形式表现,而是经由交际者实施其他具体的行为来实现,所以它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效果。比如说话人发出问候

^① 转引自刘宇慧,承红,刘宏涛,等. 英语会话分析与口语教学研究 [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01.

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维系或拉近双方的人际距离,我们可以从听话人的反应(如回应问候、微笑等言语或非言语的反应)来判断这一行为是否达到效果。此外,在一个交际事件中,调节人际距离还可以成为使用策略的目的。比如A在向B提出请求前,先问候B,运用问候拉近彼此间的人际距离,为请求的实现做铺垫。调节人际距离成为实现另一个言语行为的桥梁。选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或手段进行调节,除了受外部世界的情境影响以外,也和调节人际距离所关联的另一个言语行为有关。在我们搜集的语料中,打入电话的行为目的都是试图要人做某事,属于指令性言语行为。但在不同的人际距离下,调节人际距离的迫切度不同。比如在父女对话中,实施指令性言语行为并不会拉大彼此间的人际距离,所以人际距离的倾向是维系。但是对于推销员来说,实施指令性言语行为会损害另一方的面子,会导致人际距离的拉大,因此,需要积极使用语言手段来拉近人际距离,从而实现交际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人际距离的调控是在心理层面驱动交际者进行语言手段的调控,这是交际者主动实施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在这一策略下,交际者可以通过在会话中实施一系列的具体言语手段来达到调控人际距离的目的,比如称呼、问候、共建背景知识、对不同类型话题的转换、反馈、道别等。

本书的目的是对调节人际距离的语言手段进行研究,主要从说话人的目的来研究,这样会更有利于对语言手段的总结和归纳,当然,我们也会关注这些手段的实施效果,尽力做到结合目的和效果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2.6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1)“人际距离”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体现出交际过程中交际者之间关系的维系和变动。人际距离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由于社会结构、交往频度、感情倾向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心理认知层面的差距。它来自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动态地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呈现出维持、拉近或扩大的趋向。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并不能体现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心理层面对它们认知的动态性。角色论虽然能够展现社会赋予人的特征,但是其只着重于语言对角色的构建,而缺乏对角色之间互动的关注。同时角色的分类十分多样,所谓会话过程中进行角色变换,其实质是说话人对人际距离的调节,并且双方通过协商,可以使交际和谐,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因此,使用“人际距离”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体现出人际距离的动态性和协商性。

(2)语言具有构建和调节人际距离的功能。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